

记忆深处馒头飘香

□解红

提起烤馒头，这不禁使我想起童年，还有我那慈祥的外婆。我的外婆虽然已经去世三十余年了，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时时想起她，在我心里、梦里，总是少不了她的影子。

我小时候，父亲远在外省工作，母亲一个人在城里既要去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又要照顾全家老小八口子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于是母亲提议把我遣送回老家。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皖北农村老宅子里长大的，那时，外婆的家就成了我最温暖的港湾，外婆的怀抱就成了我最暖心的地方。

自幼我就是个爱哭闹很顽皮的孩子，用母亲惯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很不招人待见，可是外婆却时刻宠着我，她对我的童年付出了很多很多。年幼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我在饥饿难耐之时，每每品尝到外婆那里酥外黄的烤馒头片，顿觉味蕾大开，现在想起来还垂涎欲滴。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皖北农村还很贫穷，那里的村民逢年过节除了少许的鱼肉最喜欢吃的就是烤馒头。如今村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日里经常鱼肉不断，跟过年一样，所以烤馒头早已消失殆尽在人们的记忆里，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不再对春节有多少期盼了。但是，童年那香喷喷烤馒头的味道还是记忆犹新！

去年三月五日《雷锋纪念日》那天，女儿出嫁了。今年春节，女儿女婿第一次回来过年，家中年过八旬的老爸老妈早已等候多时，三代同堂相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欢度春节。以往，一到过年就开始张罗着年夜饭，就跟中央电视台每年举办春节晚会一样，既要办，还要办好。因此，吃什么好，什么好吃都觉得不那么新鲜了。大年三十晌午，我开始准备满满一桌子下酒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喝，边相互祝福着，气氛热闹极了。

这时，远嫁苏州的女儿眼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一点胃口都没有，可能是她在孕期妊娠反应的原因。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

之时，我却灵机一动，问女儿：想不想吃烤馒头？女儿立刻心花怒放，连连点头。我也毫不怠慢，赶快拿起刚出锅的馒头烤起来。

我小时候喜欢吃烤馒头，正是因为那时候处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艰苦，不能和现在一样，想吃什么张口就来。即使是白面馒头在小时候也很难吃到，外婆在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一些小麦到集市磨坊里找人磨成细面回来做成馒头给我吃。尽管馒头有多种吃法，可我最喜欢的就是外婆给我用柴火烤着吃，那才是最香最美的。外婆烤馒头的技术堪称一流的，她能把馒头烤的表面焦黄油亮，而馒头芯里却松软可口，吃起来像面包，像酥饼，满口留香，让人回味无穷。究其原因，外婆给我说出其中的秘密，就是在烤馒头时，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用急火烘烤，否则烤出来的馒头外表黑漆漆的，而馒头芯里还硬生生的，吃不得……

自从进城就再也没有吃到外婆的烤馒头了。

今天第一次出手为女儿烤馒头，我要品尝亲自烤馒头的馨香，有些沉不住气了。有一会儿的功夫，我精心烤出来的馒头终于出炉上了餐桌，全家人你一块我一块的，像吃酥饼，又像品名点，发出啧啧称赞声。因为是煤炭火，烤出来的没有达到小时候外婆在柴火中烘烤的效果，但是，看到女儿和家人开心地吃着，我敢肯定，她对我烤的馒头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告诉女儿：我之所以长得健健康康，这都是因为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吃烤馒头的缘故，烤馒头开胃健脾，助消化。因为小麦粉是温性的，放点碱，发起来的馒头本来就很容易消化。如再将它烤的黄澄澄的，它就更温了，温胃且散寒。如果有寒性胃溃疡长期坚持吃烤馒头，胃溃疡一定治好……女儿吃得带劲了。

外婆虽然离开了我，但在烤馒头的余温里，我还能感受到外婆对我无微不至的爱心！

老爸的美食

□王德明

我老爸不会做饭，基本没下过厨房，但却对一种食物情有独钟，那就是他常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下面条，打鸡蛋”。不过，他讲的面条可不是筒装挂面，而是用擀面杖擀出的面条。他讲的鸡蛋也不是荷包蛋，而是用蛋液冲成的蛋花。白面条和黄蛋花交错在一起，再加上盐、葱和芝麻油，形态诱人，香气扑鼻。

这种在当下再普通不过的饭食，竟被老爸看得如此之重，与其家乡的贫苦不无关系。他的老家在鲁西南的郓城县城关镇，说起郓城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说起《水浒》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则广为流传，那档子事儿就出在郓城。郓城位于黄河故道，土地瘠薄，一年只产一季小麦，其余都是杂粮，白面显得很金贵。土地不肥，鸡养得也就少，鸡蛋都不舍得吃整个的，要打成蛋花，扮作丰富状。那时，谁家要是能吃上一顿“下面条，打鸡蛋”，真的很了不起啦，一般只有贵客来临才能见到。这种日子给年轻时的老爸，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抗战时期，老爸在郓城邻近的鄄城县四区当区委书记，而这个区恰是母亲家所在地。母亲家是党的堡垒户，村里常安排老爸和他的人马借宿于此。每当这批八路军来时，母亲家能提供的最好的饭食，莫过于“下面条，打鸡蛋”了。当时我党地方武装的装备比八路军正规军差，老爸他们只能拿红薯秧子当腰带，还经常忍饥挨饿，这时候居然能有鸡蛋面条可吃，好似神仙之乐。母亲的爹娘平时对自己很抠，但对打鬼子的人却毫不吝惜，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这无疑深深打动了老爸。后来，老爸成了母亲家的女婿。一个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上过山东省立高中，因抗日中断了学业，能熟读英文版《安徒生童话集》的知识分子，竟愿娶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多少带有感恩之意。

如果说，“下面条，打鸡蛋”，是我从小听大的一句话，已不足为奇啦；那么，当我的战友也对此语产生深刻印象时，那就真有点可笑啦。故事还得从我的一对战友夫妇，借宿我父母家那一晚说起。部队驻地在六安地区独山镇，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更没高铁，一对要回上海探亲的战友夫妇，为避免长途跋涉产生疲惫，便想在合肥住一晚，此愿很快得到了父母的应允。来客是要招待的，如何安排这顿晚餐？老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下面条，打鸡蛋”；但立刻被母亲冲了回去：“你以为现在还跟过去一样，怎么也得炒几个菜，烧碗汤，做大米饭，不能亏待了咱德明的战友”。看到满桌的饭菜，战友妻子深感不安，连声道：“太麻烦你们二老了，让我们实在过意不去”。战友也抱拳感激：“其实，下碗面就行”。“我说吧，你们来，下面条，打鸡蛋，就很好嘛，可德明他妈偏是不同意”，有了支持者，老爸顿觉气壮如牛。考虑到老爸有点耳聋，战友特把头伸过去，郑重其事地说：“您老不晓得，部队也经常是吃面条的，每到这时，整个食堂里就会充满呼鲁呼鲁的吞吸声，声调高低不等，大得了不得，就像在奏音乐”。“啊？还有这事”，父母忍不住都笑了。

2005年，母亲病重了。这天，老爸突然走进厨房，让正在准备午餐的我妻吃惊不小。“我要给你妈妈下碗面”，他边对儿媳说边张望着找鸡蛋；由于不会和面、擀面，只能用现成的挂面代替。老爸亲手端着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笑容满面地送到母亲的床头。当时，我和妻都看呆了，这可是几十年未遇的奇观啊！然而，只见得母亲仅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老爸下面条时，压根儿就没放盐。母亲去世7年后，老爸也卧床不起。临终前，正赶上要过春节，省委常委分头看望正在住院的享受副省长级以上医疗待遇的老同志，老爸也是被慰问对象。当吴存荣书记来到他病榻前，向他亲切问候致敬时，老爸还知道要以礼相待，便略略抬身，双目睁开，但只说了简短的一句话，吐字也清楚，仍然是浓重的山东口音：“下面条，打鸡蛋”。吴书记一愣，显然没听明白；可老爸的意思，我和妻子在场的谁都清楚，就是要我们用这种美食来款待贵宾。

转眼间，父母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和妻从不搞烧纸那样的祭祀活动，却经常以“下面条，打鸡蛋”为餐。我们觉得这不光是对老人的怀念，也是一种提倡俭朴的体现。现在生活好了，条件优越了，但老一代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还是应当保持，它有助于我们养德固本，清心寡欲，规矩服务社会，安稳度过一生。

那年拾粪换粮

□佟才录

1971年的冬天，我刚满10岁。那时，我们家还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上有太奶奶、爷爷、奶奶，下有哥哥、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而母亲因为是妇女，只记半个工。每年的秋天，我们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饥荒），而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粮食。

因为粮食不够吃，在春天里我们兄妹放学后就挎着竹篮满山遍野地去挖野菜，然后妈妈和上少量的玉米面包菜团子吃，有时也做菜粥喝。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太奶奶、爷爷、奶奶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本就年老体弱的身体都浮肿了起来，用手指肚一按一个小坑，我们兄妹也被饿得面黄肌瘦，特别是两个年幼的妹妹，整天因吃不饱肚子而嗷嗷哭叫。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看到一家老小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心如刀割。万般无奈，父亲狠下心来，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换粮食”计划——父亲叫我和哥哥同他一起，在冬天里起早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事先，父亲召集我和哥哥开了一个小会，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爱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吗？”我和哥哥点头说：“当然爱了。”父亲说：“你们忍心看到他们挨饿吗？”我和哥哥使劲地晃着脑袋说：“不忍心。”父亲又说：“那我们家里的三个男人是不是该想办法让我们所爱的家人吃饱饭呢？”我和哥哥点头说：“嗯哪。”父亲说：“那我们明天早晨起就起来去拾粪，用粪换粮食……”

那时候，北方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穿上棉

袄棉裤，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闷子，脚上穿着胶皮靴，挎着粪筐，手握铁锹，走街串巷到处拾牛、马、猪、狗等动物的粪便，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3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肘子上很是疼痛，但为了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能吃饱饭，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而且父亲也有规定，我和哥哥只有完成拾粪指标，才可以去学校上学。后来，父亲看到我挎着粪筐走路趔趔趄趄的样子，很是心疼，便给我和哥哥做了一个小爬犁，让我和哥哥团结合作，我拉爬犁，哥哥拿着铁锹往粪筐里拾粪。有了小爬犁，我和哥哥轻松了许多。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得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派一些社员和生产队的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粪。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生产队的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计算，60个工分能分红60块钱或分得粮食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碴子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转过年的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田里没打出多少粮食来，到秋后一核算，生产队每个工分只够一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或2斤小米。

父亲的拾粪换粮食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了。但那一段艰难岁月却永远沉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生也挥之不去。